

徐海：《宁陕县 1957 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综述》（宁陕县人民政府网 2020.9.20）

1957 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为主题。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这些矛盾，通过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者即人民政府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而集中表现出来。解决这样的矛盾，从思想教育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要教育担负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和文化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是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提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全党整风就是着重从这方面来解决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并且学习在由革命转入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课题。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严肃认真而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整风运动开始后，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欢迎大家“鸣”、“放”，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情况，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外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宁陕县县级机关党组织整风运动从 7 月下旬开始，整风的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风运动分三个阶段，即学习阶段、检查阶段、总结提高阶段，春节前检查结束。从 11 月中下旬开始，又在农村、工交、财贸和中小学教师中开展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整改阶段、辩论阶段、总结阶段；春节前基本结束。

1958 年 2 月 22 日开始，宁陕县开展了县、区、乡干部集中整风运动，参加这次整风的有县区、乡行政、党群、教育、工商界共 1126 人，其中县、区、乡干部 880 人。这次整风运动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既要克服我们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又要克服一般干部的个人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地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要狠狠的烧掉敌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达到孤立右派、团结中间派、扩大左派的目的。运动中要求做到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取得改进工作的胜利，取得改造思想的胜利。运动分为：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整改、反省提高四个阶段。2 月 22 日，全县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梁洪山、副书记毕可昌分别做动员讲话，整风进入大鸣大放阶段，参加三千会的干部 747 人，8 天

时间写大字报 5,360 张，漫画 254 张，各类意见 14,933 条，其中，对党的领导的 6,484 条，对粮食问题的 2,202 条，对合作化的 1,354 条，其他的（主要干部互相提）4,893 条。接着进行反右派斗争。至运动结束，全县机关、学校、工商界反右斗争，批准斗争的 37 人，斗争后不够右派的有 9 人，在复查中查出漏掉的右派分子 1 人，全县定案为右派分子 29 人，占参加整风人数的 2.6%，其中极右分子 3 人，一般右派分子 26 人，按系统分：行政事企业 15 人，教育界 9 人，工商界 5 名。对右派分子处理情况，按一类处理 2 人（劳动教养，其中一名除公职），按二类处理的 7 人（交农业社监督劳动），按三类处理的 5 人，按四类处理的 4 人，按反革命处理的 11 人。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以“双反”为中心的整改工作，主要解决了四个方面问题。一是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整风后，全县原行政编制 256 人，下降到 165 人，减少 35.51%；事企业原编制 478 人，减少到 354 人，减少 25%；全县行政原有 35 个单位，合并后为 26 个单位，事企业原 10 个单位。合并为 6 个单位；随着机构的合并，干部下放，县级 90% 以上的干部向党组织申请要求下乡上山劳动锻炼，经排队全县需要劳动锻炼的 146 人，首批下放劳动锻炼的 24 人，全县精简干部 75 名，其中雇佣人员 10 人，退职 52 人，开除 13 人。二是除“三风，扫五气”，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整风后干部作风大大转变，生产劳动已经成为每个干部的自觉行动，县社半年来送货下乡 420 次，全县 346 干部大搞试验田 580.8 亩。三是“反保守、反浪费、贯彻勤劳建国”的方针。双反运动的开展，大量的揭露了在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保守思想和惊人的浪费，揭露了干部中存在严重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一些单位部门制订了勤劳办企业、勤劳办学的计划，为进一步杜绝浪费打好了基础。四是改进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整风以来，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得到改进。

1958 年夏，整风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对于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干部群众关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因此，从 1959 年到 1964 年，又进行了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帽子运动，也就是所谓的右派改造，改造好了的就摘帽子。但是，这次集中摘仅摘了一半，还有一半仍然未摘帽，直到 1978 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掉帽子的所有右派分子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 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宁陕县原定右派 29 名，其中 3 名流出，调入 8 名，共 34 名。

宁陕县的右派改造运动从 1961 年 12 月 10 日开始，对右派分子的改造是卓有成效的。自 1962 年 1 月 9 日开始至 1963 年 7 月 12 日，共摘掉右派帽子 17 名。其中地委批准 4 名，原石泉县委批准 4 名，宁陕县委批准 9 名。我县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是 1962 年 1 月 9 日，有县工商局王志斌、县银行钟建德、四亩地中心商店何俊生、县文化馆王月发等 4 人；第二批是 1962 年 5 月

13日，摘掉6人帽子，分别是徐文哲、蒋小亭、杨文升、崔国瑞、刘伯伦、桂哲融；第三批是1962年6月13日，摘掉6人帽子，分别是冯自正、廖德益、陈杨升、焦永茂、范振朝、刘兆鹏；第四批是1962年11月21日，摘掉姜绵久1人的帽子。另17名右派分子直到1978年5月，按照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统由县委审批，作出决定，所在单位党组织宣布摘帽，随后又进行了适当安置，到1980年1月底我县的右派改造运动才算基本结束。

从我县所划的右派具体情况来看，由于当时没有认真按照中央“六划”、“六不划”的政策原则办，也的确存在着许多歪曲原意、无限上纲、捕风捉影、误伤同志搞扩大的问题。实际上，我县的右派主要都是一些对工作和生活上的看法，如对高级合作社要求过急，侵犯了农民利益等，这些意见和看法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当时把这些都无限上纲，认为是反对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反右派斗争，搞了扩大化，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有的妻离子散，更重要的是耽误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做贡献的青春年华。

右派分子徐文哲就属于因对工作上的看法，如实反映问题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徐文哲历任县委秘书、区委书记、教育科长、宣传部长、县委委员。1958年整风反右时，被定为一般右派，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党的内外一切职务，降三级处分，1962年5月摘掉右派帽子。徐文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据是：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的领导干部；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干部政策；诬蔑合作化，诽谤粮食供应统购统销；同情反革命暴乱，怜悯反革命分子等。以上主要依据的由来又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得出：

1、1958年徐文哲在整风鸣放中，针对县委对有些犯错误的干部没有及时处理和个别领导的工作方法问题，给县委副书记毕可昌写大字报，说毕处理问题“优柔寡断”，对一个犯错误的干部未及时处理是“姑息养奸”，请示、汇报工作时对下态度简单生硬是“冷酷无情”等，这本来属于对个别领导措辞比较尖锐的批评，而被看作是“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的领导”。

2、1956年，徐文哲在白河工作期间，曾对教育局一干部说：“有些人旧社会拍马屁、吹牛皮、对上献媚对下压，因而工资高，也幸福”；一次这位干部找徐文哲研究工作，正值徐文哲看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便给此人读了一段并说：“旧社会是这样吃人的社会，新社会何尝没有？”这只是徐文哲当时针对一些社会现象，谈的个人看法，只是对革命队伍中有些同志和整个社会中个别现象而言的，虽然有片面性但还是有正确的因素，但是被认为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徐文哲对白河在招收新干部的条件上持有不同意见，在一次学习会上说：“吸收干部将党、团员作为一个报名条件是具体的宗派主义”，因此被无限上纲定为攻击党的领导、诬蔑党的干部政策。

3、1957年，徐文哲同志在华严大坪试办社教运动，一次向汤坪区汇报工作中同几个同志闲谈，针对大坪存在的一些小偷小摸现象说：“合作社小偷多了，真是怪事”，还说“现在合作社瞒产私分的现象很普遍”，真实反映了一些农民生

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而被看作是诬蔑统购统销。

4、1957年4月江口高桥反革命暴乱后，徐文哲在该处工作，听到县人委委员马见喜“群众对土匪问题没啥，就是没吃的，不得了”的反映，看到乡政府在粮食供应政策中存在的群众缺粮、人心不安等问题，认为“有些人当土匪是粮食供应卡得紧引起的”，“粮食问题处理不好，还会发生大问题”，便给时任马永信县长写报告汇报并要求增加粮食供应标准，还在一些同志当中说：“你给人家不吃饭，他能不闹”。因为徐文哲针对当时的实际，经过调查分析，主动向上反映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安定民心，而被定为同情反革命。

就这样，因为徐文哲在党的会议提意见、谈认识、摆看法，从安定民心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被定为了右派。从以上就可以看出，我县的反击右派斗争存在明显的无限上纲和扩大化的问题。

虽然我县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有34名，但因其中大部分属错划范围，因此仅2年半时间便改造了一半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其余17名右派分子未摘帽子的原因也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受1966年开始的急风暴雨、声势浩大、影响广泛、斗争深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需要，竭力破坏和篡改毛泽东、党中央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和部署，使改造右派分子和摘帽子工作无法进行，我县的右派改造工作也因此而暂时停止。直到1978年中央下达对所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摘掉帽子，进行适当安置的决定，1978年3月，县上又成立“摘帽办公室”，进行复查改正，专门对余下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在进行这项工作时，经历了一个“消除余悸，解放思想”的过程。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一开始，在部分干部群众中，就曾有不同反映，有的同志说：“右派的帽子都全摘了，还改啥呢”？有的认为，搞右派复查改正，是否定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有的同志说，还不如来“一风吹”算了。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也曾一怕二难，“怕”落了为右派翻案罪名，“难”在时过20余年，档案不全，难以恢复本来面目，做到实事求是。因而工作中，顾虑重重、放不开手脚。后来经过反复学习文件，领会精神，逐渐消除了顾虑，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

在摘帽、复查改正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到1979年底原划定的34名右派分子，逐一复查、全部改正。对被改正的同志，一律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开除公职的，恢复公职，开除党籍的，未发现新的重大问题，恢复党籍；凡是共青团员受到团内处分的，撤销开除、警告等处分决定；因右派问题戴普通反革命帽子的予以摘帽；错捕、错划的，司法部门复查纠正。

至此，我县的右派改造经过“摘帽、复查改正”两个阶段，前后20余年，最终以全部右派分子被摘帽、改正，又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大潮中而结束。